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八路军办事处在韶关……………云广英（1）

有关抗战时《北江日报》等的一些情况

——杨应彬同志给我会的复信……………（10）

关于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游击干训班的一些情况

……………郑黎亚（12）

抗战末期的始兴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墨 川（17）

抗战时曲江妇委会工作回忆……………冯娛修（22）

在“基庐”牢狱里的斗争……………白桦执笔整理（27）

附：魔窟——基庐

抗战时期广东财政、税务情况

附：广东财厅北迁韶关的经过……………陈孟坚（37）

韶关市仲元中学师生抗敌记……………梁宗奇（49）

记我党老朋友莫雄先生……………李学林（53）

饶纪绵起义前后……………江 军（69）

我参加连县人民武装起义的前后……………肖怀德（83）

缅怀在台被害的同学刘如心……………林祖泽（88）

在韶关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些回忆……………**杜国彪**（96）

《民风周刊》在韶关的战斗

——并悼念崔承宪同志……………**李思明**（101）

我在南岭煤矿支援地下党革命活动回忆片断

……………**李 赋**（107）

一场“民选”县长的闹剧

——陈炯明统粤时期乳源“民选”县长始末

……………**刘复英**（110）

明清时期粤北瑶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李国伟**（116）

云门山大觉禅寺简介……………**冼 宗**（126）

编后记……………（131）

八路军办事处在韶关

云广英



这是当年的云广英同志

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成立。由于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北撤韶关，办事处也随同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迁往韶关，直至一九四〇年秋。当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接党中央指令，办事处才结束公开活动而撤退。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后改名为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但在

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办事处成立和组织的情况

七·七事变后，全国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执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共同纲领，在敌后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积极对侵华日军作战，起到了抗日救国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国内人民中日益扩大；同时，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提高了打

败日本侵略者夺取胜利的信心。在广东，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各抗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港澳同胞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宣传我党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和我军抗日胜利的捷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使全省各地抗日运动空前高涨。

为了便于同各种抗日力量的联系，公开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于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从天津经上海到香港，找到担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薛尚实同志，并经他介绍，我以红军的公开身份找李章达、谭平山、陈铭枢、孙大光（孙述）、云应霖等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民主的主张，他们都表示赞成和拥护。

在香港，我和张云逸同志住九龙，廖承志同志住他母亲何香凝家。当时香港有电台直接与中央联系，中央的指示也直接发到香港，由张云逸、廖承志、张文彬等同志研究贯彻执行。当时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是广东最大的实权派，拥有七、八万武装部队，控制着广东地方政权。一九三七年冬，由张云逸出面，利用余与蒋介石的矛盾、与我党的关系比较缓和的因素，找他交涉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事宜，进行会谈，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顺利地达成了建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协议。一九三八年一月，办事处正式成立，党组织指定我为办事处主任，地址设在广州市德政北路，后移到东山百子路原廖仲凯先生的住宅。

办事处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广东省委的双重领导。一九三八年五月，广东省委派麦克（女）同志担任办事处秘密交通员工作。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人是张云逸同志。后来张调新四军工作，由廖承志同志负责指示工作。党中央、武汉

办事处给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办事处的有关书信、文件、指示，是通过秘密交通转来的。当时亲来联系较多的是王文杰同志（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但经常是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只有徐青、余萍（女）、陈英（女）、梁惠萍（女）和陈大姐五位同志，徐青同志担任秘书，他们都很坚定，积极地进行工作。

二、办事处北迁韶关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广东，第十二集团军总



当年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旧址后门，箭头所示为云广英主任办公的地方



当年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招待所旧址

司令余汉谋，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对日本侵略军毫无抵抗，让其长驱直入，十月二十二日，广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的前两天，我同王文杰、陈健同志才登上国民党最后撤退的一列火车，撤离广州往粤北。行车途中，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沿途轰炸。火车到达大坑口时，我和陈健同志下车到翁源县城附近暂住下来，王文杰同志仍随车北上。然后，我们迁移到国民党临时省会韶关。不久，广东省委的部分同志也集中到韶关地区来了。我们办事处的地址设在韶关西河西厢乡攀桂坊9号“安园”和邓观麟、邓观娣兄弟的房子里（现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南路62号），并租用邻近的钟礼泉家（现韶关市武江区武江南路工农巷34号）作招待所。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把办事处改名为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仍然由我担任。从此，办事处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当时在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工作的还有：陈健、肖力克（肖明）、赖仰高、邱松、李汉、陈英（女）、黄丽荣（女）、张玉声和邓球等同志。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工作的需要，韶关办事处公开设立电台，电台是手摇发电的。房东与我们关系很好，经常帮我们摇发电机。电台的设立，加强了省委与各地党的联系。对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三、办事处在韶关开展工作的情况

广州办事处以及迁到韶关后，在短短两年多的工作中，除了做中下层爱国人士、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外，还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广泛地进行统战工作。例如：张发奎、李章达、余汉谋、香翰屏、李熙寰、曾养甫、钟天心、谌少岑、余森文、

吴仲禧、莫雄、左恭、陈汝棠、李伯球等，我们都进行过接触。

一九三九年，中央派叶挺同志从新四军回广东工作，就是通过向余汉谋做工作，得到余的赞同，任命叶挺同志为东江抗日游击队总指挥，并对东纵各部队作了调整、整编，使东江纵队有了合法的地位和一定范围的抗日根据地。事后不久，因蒋介石电令余汉谋撤消对叶挺的任命，叶挺同志才返回新四军工作。

广州失陷后，余汉谋为了挽回他的威信和发展他的势力，他的军队迁到韶关一带后，意图用比较进步的办法复兴第十二集团军，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为了顾全大局，实行党的互助互让的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决定帮助他们。广东省委指示我及其他左翼分子向余汉谋、李熙寰、赵一肩等建议整军，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运动、重视培养青年干部等。我亲自找余、李、赵，就上述问题进行面谈，并建议他们能派出小股武装部队向侵占广州的日军进行袭扰，他们均表同意。根据省委部署，省委还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和一些党员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治训练队和政治部去工作，同时积极布置对张发奎（四战区司令官）、莫雄（韶关专员）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的支持和推动，我也亲自对张、莫、余等进行工作。这样，稳定了余汉谋的情绪，表示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使我党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得到发展。

此与同时，我们在抗日统战工作上，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团结进步势力与争取中间势力，争取时局好转的总方针下，大力帮助和推动十二集团军的巩固和进步，特别是对赵一肩师尤为重视。当时对余汉谋的动摇性也是注意到的。对国民党中央系，特别是对蔡劲军、邱誉等顽固派，则

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当党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后，我以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向国民党当局、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广泛地进行详细的宣传和解释我党的主张和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九四〇年春，当时惠阳的归侨抗日服务团博罗队的二十三位同志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押在韶关芙蓉山军法处的监狱里。我经过各方面的活动，通过进步人士莫雄、李章达等人的担保，得到无条件的释放。广东省委女干部何玉同志不幸被捕，也是经过办事处多方的交涉而马上释放的。

由于我们党做了大量团结抗日的工作，当时是韶关专员的莫雄先生，对我们特别的爱护和支持。他曾多次送来一些武器（枪枝、子弹、手榴弹等）到办事处，再由我们转交给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使用。那时国民党当局的关卡不少，给我地下党外出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莫雄先生便将专员公署空白的通行证，盖好公章，送到办事处来，再由我们转给省委使用。这样，给我们搞地下活动的同志，在行动上带来很大的方便。

一九三九年，作为广东临时省会的韶关，日本侵略军不断派飞机对市区和近郊进行疯狂的轰炸，弄得人心惶惶。市民和附近农民群众受到很大伤亡，财物遭受不少损失。而当时国民党当局，没有加强对敌空袭的防御措施。为这件事，我亲自找余汉谋严肃地提出，建议他们加强对日军飞机的射击，特别是加强空袭警报的工作，得到余的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部署，这项工作得到解决，使广大市民和近郊的农民群众减少遭受敌机的袭扰，避免了大的损失。

一九三九年冬，广东省委决定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目前国际问题和国内新的政治形势，检讨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在反共逆流中党的工作，以及进行巩固党的工作动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当时，要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召开这个秘密的重要会议是不容易的。经过做统战工作，我们找到战时救护队负责人陈汝棠进行磋商，得到他的积极支持、掩护和帮助。那时，陈汝棠正在曲江黄朗坝开办一个抗日救护训练班，里面有我们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正因为如此，省委扩大会议，就在那里秘密召开，并得以顺利地进行。

四、办事处撤退的情况

一九四〇年秋，正在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刻，我们办事处接到中共中央要我们撤退的指令，随即着手准备撤退。撤退前，办事处向各抗日的民主党派、抗日群众团体，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各机关单位发出紧急通知，揭露和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对日妥协投降的反革命罪行；让广大人民群众再次明确认识，我党是真正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而国民党顽固派是搞对日投降、搞分裂、搞倒退的。

通知发出不久，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便结束公开活动，我和张玉声同志经桂林办事处回延安。办事处的其他同志则由广东省委分配，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一九三七年，党中央派云清（后得周恩来指示，改名云广英）从延安回广东做抗日统战工作。图为与部分战友分别时的留影。后排从左至右起：云广英、陈英（女）、莫文骅、张云逸。

〔作者简介〕

云广英（革命斗争年代曾改名为云清，林秀先），原名云昌旭，字亮初。生于一九〇五年，广东文昌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先后担任过红七军经理处股长，师经理处处长、团政委，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中央军委编译局副局长兼俄文学校副校长，党“七大”代表，龙县县委书记兼保安团政委，延边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解放后历任江西省、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广东省人大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七八年后，曾分别担任过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有关抗战时《北江日报》等的一些情况

——杨应彬同志给我会的复信

编者按：在本刊第四辑发表的中大教授潘允中写的《关于抗战时期“北江日报”出版情况》一文中，因未提及报社自编副刊的情况，可能是一遗漏。我们去信潘教授再作回忆，答复是“回忆不起来了。”为了力求翔实，我们根据此文所提及的线索，特函请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杨应彬同志帮助回忆，现将他的复信中的有关部份刊登如下——

韶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二月二十日来函并附潘允中同志的信，收到。我与左洪涛同志回忆了一下，初步想到的情况是：《北江日报》在1939年时原由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进步人士，后参加了我党，在浙江工作）掌握，后潘允中、何家槐等同志接办，几个月后三青团捣鬼，后似停刊了。记得该刊除戏剧副刊外，还有副刊《珠江潮》，刊头还是当时战地服务队青年木刻工作者杨冶（野）明同志作的，郭弼昌等演戏队同志

都是主要撰稿人。但因年代已久，我当时在部队工作，接触较少，印象已不深。如能找到几份副刊，复印来看看，当可帮助记忆（编者附言：不知有谁藏有1939年初韶关《北江日报》的？请告知我们，以便能借阅复印）。

另外，当时曲江还有国民党的《中山日报》、《大光报》，我们也曾利用它写过一些文章。我就曾在帽子峰下黄岗村驻防时，写过一篇《黄岗村调查》于1939年春发表在这两份报中的一份（记不得是哪家了，用杨应彬的名字）。

（以下从略）

敬礼！

杨应彬

85、3、10

关于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游击干部 训练班的一些情况

郑黎亚

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曾在第四战区成立战地党政分会，并以这个分会的名义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共办了四期。第一期是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举办的，地点在广东韶关风度路一间小学校里。当时我们战地服务队由武汉外围随四战区司令部到达韶关后，由于种种原因被解散了。战地服务队里面有我们党的一个特别支部，支部决定，队虽然被解散了，但工作岗位还是要按南方局和恩来同志的指示坚持下去，可以化整为零，分散到司令部的各个有关部门去工作。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认为要争取合法身份打进国民党部队去，便与支部商量决定派张敬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麦新（在解放战争中于热河开鲁英勇牺牲了。当地群众为了纪念他将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麦新公社）、朱河康、时代（他撤退到新四军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杨野明五位同志到第一期游干班去工作。时间并不长，大约两个月就结束了。这五位同志分赴各个广州外围抗日战争前线去工作。张敬仁和杨野明到惠阳、博罗一带，朱河康和麦新去新会、开平，时代到三水。

第二期、第三期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们支部没有派人

去。第四期我被派去工作了，情况比较清楚些，现在着重介绍第四期的情况。

第四期游干班是在韶关东河坝墨江会馆及其附近举办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冬开始至一九四〇年春结束。他们举办这个班的目的是想培养他们游击队中下层的军政骨干，充实和加强各地的游击挺进纵队。这一期我们广东省委派了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班当学员，利用这种机会争取合法身份，推动国民党抗日、发展进步的武装力量。因此当我们从惠阳前线回到韶关要转赴广西柳州时，省委要我们派一些人去当工作人员，一方面可以在学员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也可以对省委派去的党员同志和进步青年起掩护作用。省委只告诉我们这个意图，并没有把党员的名字告诉我们，但告诉我们万一有紧急情况，可告知第二队的何锡华（是否党员我们不了解）。支部经过研究决定留下朱河康、杨应彬、吉联抗和我四个人。编一个临时党小组。朱河康任组长，并由他负责和省委领导同志取得联系。同时由左洪涛同志找张发奎，取得张的同意，用张的名义介绍进去。

我们经过努力才争取到该班工作，他们表面上说欢迎我们去，但又说班已开了课，人事已作了安排，以很难安排我们工作为藉口，不想我们去。后来我们说这是张司令长官的意图，是他要我们留下来的，他们才勉强要我们进去工作，并安排我们在三个队当政治助教（因为各队的指导员已配齐了），另一人当音乐教官。我们想，只要能进去工作，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就好了，不在乎什么职称。能争取进去，就是胜利。

这个班的主任是张发奎兼任的。主持实际工作的教育长

是谢婴白，张发奎的老部下，当过北伐时期张发奎所属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这个班的班部和各队队部人员中，一般说来，从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去的大多数是军人，这些人还有抗战热情，从国民党省党部派去的多数是政工人员，这些人思想比较反动顽固。

大队长曾伯瑶，曾任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上校参谋和警卫营长。大队下面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军事队）的学员是从各游击区抽上来的下级军官，队长和指导员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朱河康同志到一中队当助教。第二中队（政训队）的学员一部分是从各游击区抽上来的政工人员；一部分是登报招考，通过考试录取的。队长黄桐华是个进步分子，他是四战区司令部派去的，当时我们了解到他是第三党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指导员姓麦的，他虽不是顽固派，但经常在学员中散布一些不利团结抗战的言论。杨应彬同志在二队当助教。第三队的学员是从社会上招考进来的青年学生，准备培养为政工人员的。队长朱树森，是四战区司令部派去的中校参谋，他对我们抱欢迎的态度。指导员姓彭是省党部派去的，对我们不友好，处处限制我们，有时还发表一些破坏团结抗战的言论。我被派到三队当助教。吉联抗被派到大队部当音乐教官。

班的课程分两大部分，一是军事课，一是政治课。军事课除上一些军事常识外还搞演习和实弹射击。政治课是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等等，全是国民党省党部包的。我们没有机会讲课。吉联抗教些进步的抗战歌曲。我们三个人只能分别在自己的队上讲讲话，争取机会进行个别谈话，作些团结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此外，还组织图书阅览室，发动学员捐献图书，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组织进步学

员，编出墙报，激发抗战热情。我在三队学员中发现有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也主动接近我。我曾在党小组提出能否发展他们入党，朱河康说，省委规定，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发展组织，当时我心里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后来看到国民党在班上公开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时，我心里更加憋气。

我们到该班工作后，党小组每逢星期日召开会议，进行学习和分析形势。有一次分析到：自从汪精卫投降当汉奸后，在国民党军队里也潜伏着一股妥协投降的逆流，我们必须反击这股逆流。正好这时班里要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二队的条件比较好，于是我们争取黄桐华支持二队，组织学生阐明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观点，以充分的论据压倒主张妥协投降的那一派的谬论。我们事先把二队中的进步分子团结起来，作好充分准备。辩论会开得很成功，把主和派、妥协投降派批得体无完肤。对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形势教育。

我们在班工作期间，由朱河康同志去省委会报我们的工作情况，也由他从省委带一些口头指示和秘密文件回来。如毛主席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就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当时要在规定时间内传阅完，白天不能看，只好在晚上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这是油印本，纸张又差，看得很吃力。但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看到党内秘密文件，如饥如渴地反复读了好几遍。尽管当时对文件的精神还不十分理解，但总感到很重要，而且一定要照着做。自己也进一步理解到党组织派我们到国民党部队里来，到这个班里来工作，就是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人家的军队里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党中央都有政策和策略原则的规定。自己由于不能在学员中